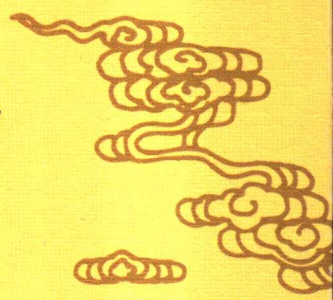




三峡大讲坛 · 重庆市领导干部历史与文化系列讲座

历史与文化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〇编
何事忠 〇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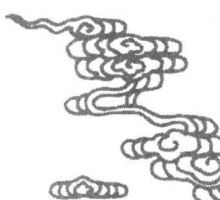


李学勤
齐康
葛剑雄
王蒙
胡惠林
庞卓恒
李准
王岳川
尹鸿
马大正
吕进
魏瀛涛
张国祚



重庆市领导干部历史与文化系列讲座

历史 文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何事忠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与文化/何事忠主编;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7

ISBN 7-5366-7977-7

I. 历… II. ①何…②中… III. 中国—概况
IV. K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895 号

历史与文化

LISHI YU WENHUA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编

何事忠 主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刘东秀 黄 艳 丁华全 郭 湛

封面设计: 李 妮

版式设计: 周 萍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重庆市渝中区双钢路 3 号科协大厦 14 楼 邮政编码 40001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78 千字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 2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调换: 023-6365895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三峡大讲坛·重庆市领导干部历史与文化系列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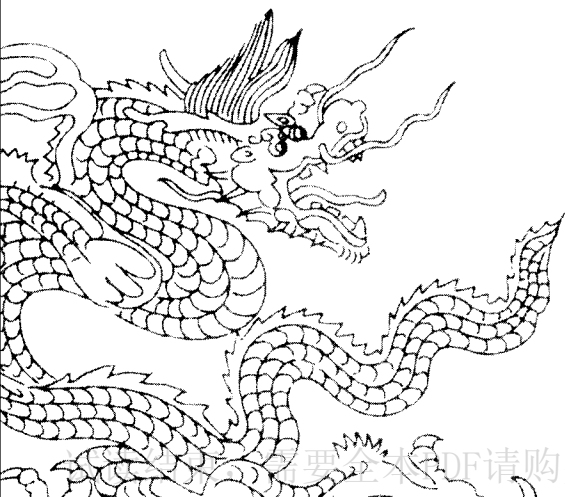


族文化起源

■三峡大讲坛·重庆市领导干部历史与文化系列讲座

移民与中国历史 国家清史工程与重庆城市

追寻中华民



目录

Contents

-
- | | | |
|-----|-----|--------------------|
| 1 | 李学勤 | 追寻中华民族文化起源 |
| 15 | 齐康 | 区域建筑文化及其保护 |
| 27 | 葛剑雄 | 移民与中国历史 |
| 59 | 王蒙 | 《红楼梦》中的政治 |
| 79 | 胡惠林 | 关于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形势与对策 |
| 103 | 庞卓恒 | 从世界历史看文明兴衰的规律 |
| 139 | 李准 | 经济全球化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
| 167 | 王岳川 | 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
| 193 | 尹鸿 | 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 |
| 221 | 马大正 | 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 |
| 241 | 吕进 | 小康社会与文化修养 |
| 265 | 隗瀛涛 | 国家清史工程与重庆城市 |
| 277 | 张国祚 | 文化与国力 |

第一讲

追寻中华民族文化起源

◎ 主讲人 清华大学教授 李学勤

专家简介:李学勤,1933年3月出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会长,中国秦文研究会会长等,并兼多所大学教授。20世纪50年代开始,李学勤研究甲骨文和战国文字,并首先鉴别出西周的甲骨文,同时提出战国文字分为五系的观念。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新出青铜器研究》、《比较考古学随笔》、《周易经传溯源》等。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演讲主题就是追寻中华民族文化起源。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经典作家马克思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里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在全世界的科学界有很重大的影响。马克思说：“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学。”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它是一个统一体。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学，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克思根据他深远的眼光，科学的预见，看到了全世界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统一体。马克思的这句话里面特殊的创造性，就是他把自然史和人类史联结在一起来考察。因为从整个宇宙一直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它是一个统一的发展。从宇宙的起源开始，一直到我们人类今天，是一个整体的发展过程。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历史是自然史，这是自然科学研究对象。人类出现以后，是人类史，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马克思在他这种对科学统一的观点里面，把自然史和人类史看成一个统一的过程，所以他就说所有的科学都可以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有自然史和人类史，也就是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一观点是极其重要的，一直到今天，对于 21 世纪的科学发展，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整个自然史、人类史上有几个起源问题，首先是宇宙的起源。大家可能有这么一个观点，说宇宙怎么还有起源？时间是不是还有起点？难道说在我们整个宇宙以前还有一个宇宙不存在的时代吗？其实，我们的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里面早就阐明这个观点，认为宇宙应该是有起源而且是有终结的。一切客观存在都有他的起源，有他的终结。现代的物理学和宇宙学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前些时候，有一个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叫霍金，到中国来做演讲。他的理论就特别指出了宇宙是有起源的。按计算，宇

宙的起源,现在世界科学家比较公认的大约是 150 亿年以前。这样的话,宇宙就有起源了。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他的具体观点,宇宙的起源问题是现在科学研究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然后依着自然史的发展,我们来看第二个起源问题。我想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我们的世界——地球的起源。当然我们还可以放大大一点,我们地球是在太阳系中间,太阳系又在银河系中间,我们可以说是太阳系和银河系的起源,这又是一个起源问题,就是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世界的起源。如果说宇宙的起源是一个宇宙学、天文学问题的话,那么地球的起源是一个天文学也是一个地学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在这个地球起源之后,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还有一个重要的起源问题,科学上的重大问题,是生命的起源。宇宙本来是没有生命的,是无生的,怎么样由无生变成有生?生命是怎么样在这个自然界里面起源的,这样的问题不但是个地学问题,也是一个生物学的,或者严格说是古生物学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生命起源问题之后,还有一个起源问题,就是我们人类的起源问题。我们人类是和所有的其他的动植物都不相同的,虽然我们也是动物之一,究竟是与其它所有的动物不一样。那么人类怎么起源的?这又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特别是我们现代的人是什么时候起源的?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答案。很多科学家探索,认为可以追溯到 200 万甚至接近 300 万年前。很多人认为最早的人类的发生可能是在东非一带,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中国的领土之内也有人类最早期的发展,因为现在发现在我国境内的人类遗迹,已经超过了 200 万年。人类的起源问题当然是重大科学问题。

大家不要忘记了,在人类的起源之后,还有一个重大的起源问题,那就是文明起源问题。大家想一想,人类在动物界里面出现了,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化,重大的进步,可是人类如果没有从野蛮得和动物差不多相同的状态脱离出来,进入文明的状态,那么人类也就没有他的特殊意义了,那就不过是猴子的一种吧。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

出一个新的世界,使整个世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由于人类创造了文明。文明是有别于野蛮的,也有别于自然界一切以前的存在,所以文明的起源问题在科学上同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说,人类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我们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我们说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为什么不说不四千年,也不说六千年,说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由于我们传统历史文献有这样的记载。大家知道我们讲的史书,有正史、有别史、有杂史,所谓正史,大家知道,就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什么?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是司马迁的《史记》。这是西汉时期的著作。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我们的历史从什么时间开始呢?他的头一篇叫《五帝本纪》,是哪五帝呢?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这是五帝。五帝的第一个就是黄帝。所谓炎黄,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实际上炎帝比黄帝还要早一点,炎黄时代的黄就是黄帝。按照司马迁《史记》来说,黄帝是我们人文的初祖。现在大家到陕西的黄帝陵去看,那里挂着一匾,写着“人文初祖”,就是说我们文明时代的开始是黄帝。黄帝离我们有多长时间呢?按照传统的说法就在五千年左右。大家知道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当时不再用清帝年号了,用黄帝年号。有人说黄帝年号是四千六百多年,也有人说是四千七百多年。总之,黄帝的时代离我们现在有四千六七百到五千年左右,传说吧,不能说那么准确。所以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和炎黄子孙的说法没有差别。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对于维系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对于联系我们和在海外华人华裔的关系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在座不少的领导和朋友们都有机会到海外去,你如果和海外的华人华裔多加接触的话,一定会感觉到我们的这种民族的向心力。在这里能不能允许我讲一个故事,也是我常常在演讲中提到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刚刚有机会到国外去,那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代表团到澳大利亚,那是我第一次去澳大利亚。到澳大利亚之后,访问了很多大学,其中有一所大学是澳大利亚历史最久的,是在澳大利亚建国以前英国殖民时代就存在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悉尼大学,这个

大学是非常著名的。我们代表团坐在那里,那个会场大概有今天会场三分之二这么大,下面坐的人没有这么多,可也不少。忽然后面有一位须发苍白的老者走到我前面,用英语问我:你能不能说英语?我说我可以说英语。他说:“我非常惭愧,我虽然是中国人的后代,可是我已经不会说中国话了。”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的第四代子孙。这位学者是非常著名的,可以说是在整个东南亚最有声望的会计学家之一。他讲:“我很想把我的著作送给我的祖国。”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他第一次看到我们大陆有代表团来,非常激动,然后他就把他的著作拿来了。这给我们造成了一点困难,因为他的著作有很高一大叠,我们代表团没法带,我们只好用汽车把它拉到大使馆,请大使馆用海运给我们运回来。

所以大家看,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对于维系我们的民族团结,对于巩固我们华人的凝聚力是起了很重大作用的。因此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从科学上来说明我们的文明是什么时候形成和怎么样发展,特别是我们文明发展的过程对整个人类创造一个文明世界做了什么样的贡献,这一点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在这里,我也要特别强调,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这个问题当然会怀着充分的爱国主义热情,而且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爱国主义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会起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有一点,也要特别声明,我们的科学研究不能被感情所左右,因为科学所研究的是客观的事实,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已经过去,是我们今天用任何方法都不能改变的。我们所能改变的是我们怎么样认识历史,而不能够改变历史的客观存在。我们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研究之中也不能为我们的爱国主义感情所左右,不能像有些人想的,我们古代的历史拉得越长越好,好像越长越光荣。其实结果适得其反,因为你拉得太长,它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不符合历史事实,总会被学术界所揭穿和驳倒,这是没有任何益处的。科学就是科学,科学不能被感情所左右,可是科学真理会极大的促进和推动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

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就谈到这里。

下面我谈第二个问题: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

大家知道,夏商周是我们古代的三个朝代,而这三个朝代是我们古代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阶段。研究夏商周,需要给它设立一个年代标尺。因为从科学来看,没有一个年代的标尺,就无法研究历史的内容。具体说起来,“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什么意思呢?“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的年代学问题。就是说那一个朝代,那一个王在什么时候,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进行论证。“工程”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政府支持、专家负责”。政府支持,政府不但是在经费上而且在组织工作等各方面都给予工作的便利。专家负责,就成立专家组,由多学科的专家来负责,任命了四个首席科学家,代表了四个大的学科:天文学、科技测年、历史学和考古学。实际上整个的工作涉及的学科有十几个。在1996年,我们组织了一个有21个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包括全国一些地方,当然北京的要多一些,由这个专家组来负责整个工作的运作。“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它设计的时候就明确它的目标是为了给中华文明起源和它早期发展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我们国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个系统工程,以前从来没有做过。

这个“工程”一共设立了九个课题,九个课题以下设立了44个专题。总的目的就是要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走第一步。各位可能会问我一个问题,首先要问的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这个名字还是不好解释啊,究竟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产生一个什么结果?你们是怎么做的?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这个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用新的多学科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年代学的问题。刚才我讲的听起来好像太专业,其实年代学的问题自古以来都在研究。年代学问题就是说,夏商周这三个时代,特别是夏商西周,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从什么年代到什么年代。大家可以说古书上不是有吗。古书

上对这个问题有不少说法,但都是有矛盾的。从现在如果一年一年往上推,我们的精确的历史年代只能推到公元前 841 年。大家说为什么是 841,不是 840,也不是 842,为什么是 841? 这个还是得回到司马迁的《史记》去。刚才我们讲过的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有年表,年表的头一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这个共和元年,按公元算就是公元前 841 年。什么是共和元年呢?我想在座的很多都知道,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有。在西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王叫周厉王,他是一个很坏的君主,对人民非常暴虐。特别是他尤其专政,他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贪官。他又任用了一些坏人,把老百姓的利益统统垄断起来,所以大家不能忍受。不但人民不能忍受,连朝中一些大臣都不能忍受,最后造成国人起义,就是所有的人包括他周围的一些臣子都起来,把他赶走了。赶走之后,就没有王了,朝廷由两个大臣来执政,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召公,这个就叫共和行政。“共和”这个词就一直传了下来,后来就拿这个词来翻译希腊人说的 republic。今天我们讲“共和国”这个“共和”,还是这个词。司马迁《史记》里面的年表的最开端一年就是公元前 841,是共和元年。共和元年以下的年代没有问题,得到公认,可是公元前 841 年以前就模糊不清。司马迁在书里说了,他看过很多关于年代的记载,有些书我们无法看到,因为司马迁时代的很多书后来已经不存在了。他看见这些书里面从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可是这些年代记载互相矛盾,互相不同。司马迁是很谨慎的,既然这些年代互相矛盾,他就不能把它们编成年表。因此,在司马迁的书里面在公元前 841 年共和元年以前就没有年表,而只有世表,即一代一代的表了,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从司马迁记载公元前 841 年共和元年开始,到现在也不过是 2 800 多年,这样说起来我们差不多 2 000 多年的历史没有一个明确的年表,这一点是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的。司马迁之后,在西汉晚年,就有人开始研究,比如西周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西周的开始大家知道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大事,就是武王伐纣。武王伐纣是在哪一年呢?西汉末有一学者根据当

时他掌握的资料,提出这一年是公元前的 1122 年,这个学者叫刘歆。在他以后,不知有多少学者在做研究。到了后来,中国考古学发达了,又有一些新的考古材料,中国的学者、外国的学者提出过许多种说法。就武王伐纣这一年代来说,据统计有 44 种说法,有 44 种不同的数字,从最早的到最晚的那个数字之间的间隔有 112 年。大家知道,整个西周也不到 300 年,这个武王伐纣年数差 112 年,这就没有意义了,在研究上没法研究。我们怎么讲我们的历史啊,我们讲不了啦。

对于夏商周这类年代学问题,我们要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的方法来提出有科学根据的说法,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对传世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整理研究,特别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计算,推定其年代。对典型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分期研究,并做必要的发掘工作,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的和 AMS(加速器质谱计)的碳 14 测年。在这样的基础上,综合成果,制订“夏商周年表”。“工程”预定的目标是: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从 1996 年的 5 月 16 日那一天正式启动的。经过了 5 年左右的时间,多学科 200 多个专家的努力,我们得出了阶段性的结果。

我们说成果是阶段性的,因为还有一些地方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是还可以补充修改,可是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作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性成果在公元 2000 年的 9 月份通过了国家的验收,11 月初的时候我们经过向国务院汇报,把这个结果公布了。我们公布的一个核心的成果就是“夏商周年表”。在新的年表中,夏代约为公元前 207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商前期约为公元前 1600 年至公元前 1300 年,商后期为公元前 1300 年至公元前 1046 年,武王伐纣为公元前 1046 年。这个年表其实大家看也没有什么,完全可以印在一张

纸上,可这是200个人做了五年的一个初步成果。当然我们的研究报告、发掘报告、实验报告大概有二十几本书吧,现在已经出版了七八本,其他的还在陆续出版之中。我们做出来的“夏商周年表”,已经为若干方面所采用。当然没有强制性,不是说一定要用这个年表,不是这样。

大家说你们这个年表有什么特点?你们怎么做的?怎么样通过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举一个怎么定西周一个王,叫周懿王的元年。他的元年我们有办法把它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涉及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大家知道汉朝之后有三国,三国之后是晋,大家看《三国演义》,最后是三国成一统,一统就是西晋。西晋初年的时候,在河南的汲县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战国时代的古墓,古墓里发现了一些战国时代的竹简书,有一种我们叫作《竹书纪年》。这个《竹书纪年》里头有一个记载,它说周懿王元年的时候“天再旦于郑”。五个字,“天再旦于郑”。“再”,两次,“旦”就是天亮,“郑”是一地名,在陕西的华县,就在华山一带。这是怎么回事?天怎么会亮两回,我说一下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大家知道,早晨你看见太阳本身以前天先亮起来,因为大气有光线的折射,太阳还在地平线下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这是所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的。然后看见太阳逐渐出来,太阳完全出来了,天光大亮。《竹书纪年》记载的“天再旦”是日全食。这个日全食在太阳还没有出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这个时候它影响不大,所以天照样开始发亮。太阳继续上升,日全食加甚,等食分已经到了极限,天又黑了。等太阳再升高,日全食过去了,天又亮了。天亮了两次。这件事,以前有学者做了很好的推算,事情确实有的。可是,科学上的计算跟人的实际感觉有时未必一致。比如说根据科学计算,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或者怎么样,可是由于其他条件,你的感觉未必是相同的。所以,虽然刚才说的那些学者,通过精密的现代科学计算,证明了是有这样的事,可是当时历史上的人没有这样的科学证明,他就是凭眼睛看。当时管天文的官吏,他就是凭眼睛观察记录的,是不是真正能认识到

这一点值得记录下来,这需要验证。正好在我们“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验证机会。1997年3月份发生了一个日全食,这是我们可见的20世纪最后一个日全食,“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专门安排了人去观测这次日全食,从而印证了史书上的记载和学者的推算。

下面我们再谈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概况。

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年代学问题,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枯燥,没多大意思。可是它是最基本的,是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基础,那么我们怎么讲中华文明的起源呢?中华的文明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形成发展,在夏商周时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讲了半天没有一个准确的年代,那就说不清楚了。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在这之后,根据国家的组织安排,我们进行了一个工作,叫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我们想对中华文明本身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进行研究,这个课题规模非常大,需要很多学科各方面的研究配合,非常困难。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先做预备性的研究,也可说是实验,这个实验我们在“十五”计划里用了3年,就是2001年、2002年、2003年,实际在2004年1月已经结题了。我们的“预研究”包括什么内容呢,我们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商周再往前推。我们设想最好是再推1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这样推的结果正好符合传统所说的五千年文明史,到达炎黄的时代。可是在“预研究”的时候不能一下做那么大,所以我们先推500年,推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差不多就是我们古书里说的尧舜的那个时代。地区上也缩小,我们不是在全国范围来看,而是在夏商周三代王朝的中心,就是中原地区,主要的地方是在山西的南部和河南的北部,晋南豫北这块,我们进行仔细的考察研究。

中华文明的起源经过了这么些年的探索,我们对它有怎样的认识呢?在这里要特别说明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认识,非常不成熟的。可是从科学上来说允许我们做一些推测。我想我们现在有一个趋向性的看法,当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会同意的,可是趋向性的看法是可

以有的,那就是比原来想象的文明形成的时间要更早。现在有一些外国学者说中国的文明是从商代开始的,甚至是从商代的后期,就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在以前他们认为靠不住了。现在经过多年的考古、历史等方面的研究,觉得他们的这些看法恐怕是不合适的。

最后,还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我来大胆的谈一谈中华文明里的巴蜀文化。

在20世纪,我们的学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总体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到区域文化的研究,分地区来研究,这是学术发展前进的一个标志。因为从整体概括的研究到区域的研究,通过区域研究再丰富整体的研究,是很大的进步。将地区性的古代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的独立名称提出来,最早的是吴越文化。因为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活动中心是在南京、上海这些地方,对于吴越这个地区特别重视,学术界也受这个影响。当时,我念书时用的地图是《申报》地图,这个地图打开头一幅,可不是河北省,是江苏省,江苏省排在第一位。那时很多学者集中南京、上海一带,他们就提出来要研究吴越的古文化。吴越文化是最早提出来的。其次一个提出来的就是巴蜀文化。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古文化方面的提出,是在抗战时期。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国民党政府就迁到这里来,这时一大批学者也随着抗战形势的变迁,迁到湖南长沙,后来就到了重庆、成都一带,甚至到昆明。在这以前,中国考古学界对巴蜀应该说是没有多少了解。但随着大量学者入川,到了重庆、成都一带,大家对巴蜀文化就重视了。正好在那个时候,在成都白马寺地方发现了相当多的青铜器,得到广泛的宣传。后来当时出版的刊物——《说文》月刊出了巴蜀文化专号,巴蜀文化的考古研究就兴盛起来。这点大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如果大家有兴趣到重庆市图书馆去,《说文》月刊三卷六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巴蜀文化专号,土纸印的,我建议应该再版,今天学术界要找这材料很困难。巴蜀文化在那时提出,后来一直在研究,特别是四川的学者们一直继续这方面的探讨,有很多成果。解放以后,区域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巴蜀文化的研究也继